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中国辩证法

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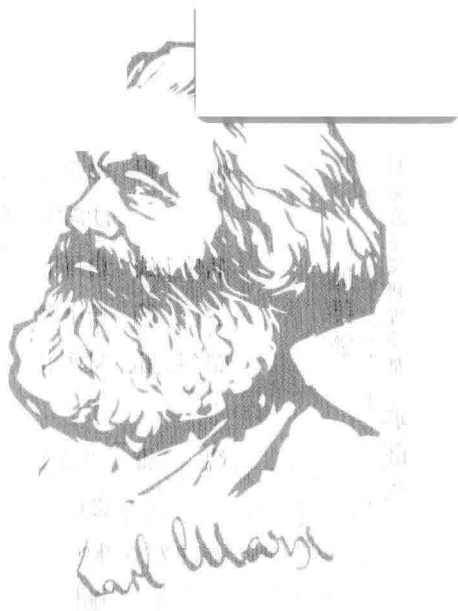
Chinese Dialectics

From *Yijing* to Marxism

[美] 田辰山 (Chenshan Tian) / 著

萧延中 / 译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中国辩证法

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

Chinese Dialectics

From *Yijing* to Marxism

[美] 田辰山 (Chenshan Tian) / 著

萧延中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美] 田辰山著；萧延中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ISBN 978-7-300-23416-8

I. ①中… II. ①田…②萧… III. ①辩证法-哲学史-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400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

[美] 田辰山 (Chenshan Tian) 著

萧延中 译

Zhongguo Bianzhengfa: Cong Yijing dao Makesi Zhu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2.75 插页 3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2 00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委会

顾问 徐崇温 贾高建 顾海良 李景源 陈学明
欧阳康 高宣扬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 编 杨金海

副主编 贺耀敏 冯 雷 鲁 路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曹荣湘	成 龙	段忠桥	韩立新
黄晓武	江 洋	靳书君	孔明安	李百玲
李惠斌	李 玲	李义天	李永杰	梁树发
林进平	刘仁胜	刘元琪	陆 俊	鲁克俭
聂锦芳	万资姿	王凤才	王虎学	王 杰
王治河	魏小萍	徐俊忠	杨学功	姚 颖
于向东	臧峰宇	曾枝盛	张 亮	张廷国
张 彤	郑吉伟	郑天喆	郑一明	周文华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问世已逾十五个春秋，出版著作数十种，应当说它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为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将继续加大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力度。

“译丛”在不断成长壮大，但初衷未改，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内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翻译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而根本目的是借鉴当今世界最新文明成果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译丛”的鲜明特征是与时俱进。它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断前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套丛书的使命，就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尽快把这些新的思想成果介绍到国内，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一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

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

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身的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

“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16年6月16日

于北京西单

序言一

朱熹写过一首诗叫《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一本书能够给读者这样的感受，在读者的脑海里呈现出天光云影的美景，从而激荡起无限美妙的思想活水，那这一定是一部好书。田辰山先生的新作《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读着书稿，我深感有一种已经久违了的哲学反思的冲动，有许多纯粹理性的问题涌现于脑际，或时隐时现，或茅塞顿开，或游思于中外，或仰俯于古今，有一种游目骋怀的乐趣和理性升华的美感。

“问题”的提出一向是标明着人的某种存在状态。由于每个人的“存在世界”不同，境遇不同，所“碰”到的“生存之壁”各异，思考问题的意向性有别，故而对同一事物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有着不同的所指，所依据的材料也常常有别于他人，结论当然也就极为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然而，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差别，“交流”才成为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只有通过交流，人们各自原本孤立的“自在世界”才能相互碰撞、彼此打通、交融互射，从而逐步形成“共在世界”，实现在某一问题上的“共识”。人类认识的进化大多要通过此种途径。

田辰山先生在本书中提出并力图回答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变成存在于中国语境中的这种形式”。这个问题对中国学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转化成我们习惯的说法就是“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以及它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由于作者长期在美国从事理论工作，又有一定的中国文化背景，研究这个问题的视角和境遇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无论就其分析理路还是得出的结论而言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引发我们多方面的思考。

作者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人所说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与作为欧洲文化遗产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所指涉的并不是同一种内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中国思想之间显示出的“第三种路径”。尽管这些说法与我们通常的表述不完全相同，但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是鲜明而中肯的。的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的理论结晶。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讲了多年，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如何实现中国化的问题，缺乏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传统优秀思想相结合，并在今天和未来如何继续承接和发展的的问题，缺乏学理上的透彻分析和深入研究。

可贵的是，田辰山先生的结论是在深入研究问题的基础上得出的。尽管该书的书名涵盖面比较广泛，但实际上它不是一本中国哲学史著作，也不是一本关于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是专门研究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是如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结合而形成今天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著作。作者重点研究的是，中国人是如何获得对来自西方的辩证法（“dialectics”）的理解的。换个角度说，作者要说明的是，中国人是如何把中国传统的“通变”思想体现在“dialectics”（辩证法）之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成为被中国人所广泛接受的思维模式的。

作者对中国传统辩证法精髓及其与西方辩证法之关系的理解也是值得认真体味的。他在分析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辩证法的研究得失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辩证法思想，借鉴郝大维、安乐哲关于中国哲学的“互系性”（correlative）思维模式的理论，提出了“通变”（continuity through change）概念，并把它看作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鲜明特征。在他看来，西方传统辩证法的核心是二元论，即主客对立，不可以通约，所以常常出现二元分立观点，要么是唯物论，要么是唯心论；要么是决定论，要么是意志论等。中国的辩证法则与之有很大不同。尽管中国辩证法中的核心思想也是“两极性”（polarity），如《易经》中的阴阳概念，但在这里，二者的关系不是决然对立的，而是互为前提、不可分离的。阴阳、高低、上下、

祸福，乃至主体与客体等等的关系都是“互系性”地联系着的，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尽管有主要与次要方面的分别，但没有绝对的永恒的分立，在一定条件下二者之间可以转化。换句话说，在中国人的辩证法里，也有本体论，但这种本体论不是西方的那种“本质本体论”（ontology of substance），而是中国式的“事件本体论”（ontology of events）。也就是说，在中国辩证法中，从来就不是执于一端，而是要考虑事物之间的总体性关系；把这个观点应用于实践，就是主张“变通”，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坚持“权变”，灵活把握事物的发展态势，保持事物发展的和谐状态。

我认为，田辰山先生关于“通变”思想的论述把握了中国辩证法的精髓。顺着这一思路前行，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不仅能够更加深入地直接体味中国人思维结构深处极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且能够从哲学思维方式的深处窥见解开中国文化何以能够古今贯通、不断绵延繁荣的智慧锁钥。不是吗？中国文化历经五千年而一以贯之，又不断发展，这在人类文化史上是仅见的，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国人的开放包容而又不断革故鼎新的精神是重要原因。譬如在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有两次大的外来文化传入，一次是佛教的传入，一次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人每一次面对外来文化都不是简单地将其拒之门外，而是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学习和吸取其中的精华，从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于是便出现了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观：佛教产生于印度而发展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而繁荣于中华大地。广而言之，中国的文化多元、宗教多元情况是其他民族国家所难以比拟的，但中国历史上很少发生西方意义上的文化冲突，更没有宗教战争。在不少地方的寺庙里常常可以看到儒、佛、道三教并存，和谐相处的情况。这种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现象，在中国人的思想中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中国人的这种开放包容精神根源于何处？从哲学上讲，这与中国人很早就养成的这种“生生之谓易”“通变之谓事”的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既是一种宇宙观、辩证法，又是一种生存论、价值观，还是一种主体的实践哲学、处世之道。中国人历来讲究“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把那些不可证明的超验的东西搁置起来，不让它们影响自己的实际生活。所以，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训诫。正是由于中国人的哲学具有这种很强的实用性，它很难发展出西方人那种绝对超验的哲学逻辑体系来，更不会有西方那种至高无上、逻辑严密的神学理论体系和坚实的神学信仰体系。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这种思维方式妨碍了中国人纯粹理性的发展，但却极大地发展了中国人的实践理性。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论作为形而上的“道”，还是作为为人处世的“理”，抑或作

为形而下的“器”，都是为人的现实生活服务的。所以，中国人讲的“道理”，不是指纯粹物质世界的规律，而更多的是有人参与其中的“事理”。由于人们的生活实践日新月异，所以中国人特别崇尚“变易”，力求在变化中求得自己的“常存”。“变通”就是最重要的“事理”。“变则通，通则久”，既被认为是一种事物的客观规律，又被理解为主体的实践之道。这同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一致的。

田辰山先生以对中国传统辩证法精神的深刻洞见为基础，透彻分析了“通变”思想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影响，同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相遇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并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思想的分析，说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点。他还以此为根据，对西方学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评价。所有这些，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乃至深刻把握中国文化的特点和走向，并促进中国人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也应当看到，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作者的有些观点不一定与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一致，有的用语也带有西方学者或作者自己的特色。这些就留待读者去辨析和评价吧。

杨金海

序言二

这是一部及时的书，一部重要的书，一部颇显洞见的书，这也是一部具有先见之明的书。在《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田辰山对辩证哲学之新兴的、历史性的和特殊的解读，进行了辨析，这一辩证哲学在 20 世纪超过 2/3 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中国文化中明显地占有支配地位。目前，至少在名义上，中国哲学已从一种“毛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了一种驳杂的“新儒学”，但作为一种传统中国思想的恒久主题，那种被田辰山概括为“通变”形式的辩证法，却仍然在现在流行的众多思潮中显示着持续的生命力。

田辰山把分析焦点突出地锁定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纯粹中国版本的新兴形态上。在传统中国的思维路径与作为西方政治流派之一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的界面，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正是从这一与其具有关联的交互界面中汲取思想营养。虽然梳理的历史和思想文献脉络是非常广泛的，但田辰山真正实现的有说服力的论理，是很具体的。用细致、具体的分析，田辰山在一场“汉学革命”中喊出了他自己的声音。这场“汉学革命”倡导“以中国自己的情况去理解中国传统”。他是从分析一些现代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化约主义入手的。许多西方解释者都毫不犹豫地采取二元二分法，以“意志论”与“决定论”之间的二元对立，作为把中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自己的辩证法分割开来的方法。另外，他们有的人又拒绝接受上述二元性的分析方法，而是把

马克思主义化约成一种互系的马克思主义，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一些其自身从来没有的东西，并同时忽略掉了需充分体会的“毛主义”所明显具有的中国特色。

田辰山的入手之点也是近些年西方学术界所做的努力方向，区别在于：一方面是建立在神学本体论宇宙观之上的西方形而上学假设；另一方面是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印欧经验的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的、互系性的宇宙观。前者的形而上学认知是回溯性的（retrospective），它诉求某种独立和超越的本源，以此建立、支撑伟大的设计，这个设计在我们面前以二元辩证证形式展开。而在《易经》中存在的范例形式的互系性宇宙观，则是前瞻性的（prospective），它期待的是通过人类与自然界的合作所可以实现的和谐。

为了分析毛泽东的偶然性辩证法与黑格尔目的论的必然性辩证法之间的差别，田辰山通过回溯、考察一些中国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瞿秋白等），向人们揭示，即使在辩证唯物论原理最早移植的形式中，已明显具有中国的面孔。田辰山发现，在瞿秋白的文稿中，马克思主义语言中融入的传统中国用语，已然将马克思主义带入了中国环境。通过概述辩证唯物论反对者（如张东荪、张佛泉和叶青等）和倡导者（李达、艾思奇等）之间的争论，田辰山指出，这种对话形式的扩展和延伸，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意义，使它变成一种针对中国革命的特定历史和当时条件的理论。艾思奇为了使作为哲学理论的“门外汉”的人们能通晓艰深的哲学话语所做的通俗化努力，只是在实现理论抽象性与日常实践真实性统一上的一种最显而易见的运作。而这恰恰正是互系思维所具有的特性。

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定形的通俗表达，是成就于毛泽东本人具有强大感染力的通俗化著作中。实际上，正是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经典与外国“主义”之间最开放的互系关系。这一具有鲜活力量的实践本身，就是“通变”思维的范例。田辰山在结论中认为，要想理解当代政治词汇不断中国化的转义情形，例如“法治”“理性”“权利”和“民主”等等概念的本身转义，对“通变”思维的深刻领会是必要的。于是，要确定一种中国未来将采用的进化的民主版本形式，“通变”思维将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力量。

此外，在对 20 世纪中国史的这一叙述中，还有其他的政治学和哲学的重要启示。比如在政治层面上，毛主义时代所做出的深远贡献和一些过分的举措，都必须作为中国经验的整体构成加以理解。毛泽东不是外国人的出常现象；他是一位中国哲学家，而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

在哲学层面上，中国“通变”思维可对一个刚刚兴起的西方哲学话语做出很多贡献，这一话语在其后的达尔文批判中，正在清洗其自身所一直持守的神学本体论宇宙观假设。也就是说，一个中国自然宇宙观与西方新兴的过程意识之间的汇流即将出现。中国自然宇宙观于生生不息的互系关联之中发现了秩序的意义，而处于崛起之势的现象学、解释学，特别是杜威的实用主义等的过程意识，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西方哲学。换言之，西方所习惯的“原动者中心”概念意义上的创造性（它创自于无，为意义的来源提供原始出处）这种概想，将让位于一种根本上由情势决定的概想，而情势决定概想的创造性理念，在生生不息互系的关联中，是意义的聚合性产生。这种极其深刻的变化将使传统中国哲学成为灵感的源泉，成为西方哲学思维新方向开拓的批判武器。同时，它也为把旧“比较哲学”带入切实的全球性“哲学化”新时代，提供一个平台。

这正是像田辰山这样的学者的创新思维。他们的创新思维将使具有鲜活力量的“通变”实践成为一条新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参与其中，创造出文化比较的丰硕新成果。

[美] 安乐哲 (Roger T. Ames)

中文版序

夏威夷，午夜已过，偶尔有远处传来的飞机起飞或汽车驶过的声音，相伴的也有凉爽的风吹动窗的声音；否则，人们正在酣睡，十分静寂。

我的英文著作《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马上要出中文版了，需要写个《序》，介绍一下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课题，它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让自己的思路回到这个问题上，油然而生的第一个感觉是时间过得好快。这个问题的研究过程已花去了我十几年的时间，起初决定做这个研究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不过对当时的回忆，立刻激活了心中曾经的兴奋，也带来现在的欣慰。

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到美国求学的一些年，我经常发现，在中国学到的西方学术概念所带有的含义与它们的英语对应词汇原本的含义相去甚远。比如，汉语“超越”不含英语“transcendence”的本质割裂性的深层含义；“辩证法”较之“dialectics”，更具有相反相成的含义；“矛盾”与其说是英语“contradiction”，不如说是“一矛又一盾”；“普遍性”不是“universality”，而是“无处不在”；英语“unity”通过汉译变成现代汉语词汇的“统一”，也基本失去了它原有的深层含义；“理论”一词，延续着的本是宋明理学的含义，已不含英语“theory”“未经证明假设”的基本含义；“实践”和“practice”也变得如同陌路人一样互不相识。

于是，我开始想，中国人所解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否不是欧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意？几乎是在思索这一问题的同时，我接触了郝大